試論政改的深層次矛盾

新思維網絡

馮煒光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四月十四日中央和特區政府聯手泡製了一場特區政改方案公關安排，意圖讓香港人明白執政當局是有誠意解決政改問題的，然而效果卻十分不理想。喬曉陽的講話並沒有具體觸及何謂普選，這便讓一向對中央政府缺乏互信的泛民深感沮喪。

若從喬曉陽講話的字面來看，可以解讀成中央政府是試圖以法制的步驟（即所謂政改五步曲）來阻攔香港人實行普選，再加上有人大常委於二〇〇四年以釋法方式粉碎香港二〇〇七及二〇〇八年普選夢的前科，港人會認為：若今天沒有具體保證，人大常委隨時可以透過解釋權及法制程序來達成政治目的，那麼港人自然擔心喬曉陽四月十四日的講話只是誘使泛民支持二〇一二政改方案的緩兵之計，待輕舟已過萬重山，政改方案真的通過時，中央政府又會以其他法制手段拖延實行普，又或者真的實行了普選，卻只是一個徒具形式的普選。

例如透過人大釋法把現時已經因張宇人議員的差勁表現而成為過街老鼠的功能團體理解成普選的一種，又或重施董建華在二〇〇二年競選那種「唯我獨尊」的提名方式，把所有特首候選人都擠走的方法來實行特首「普選」。

向大地產商傾斜

上述情況只會令社會矛盾更加深，社會上政治精英無法透過一個大家都認可的政治制度來合理解決政治爭議，這樣只會令群眾對政府失去信任，一遇上危機民眾便會以大規模抗爭方式來表達對政府積壓的不滿，泰國以至中亞國家如吉爾吉斯斯坦近日的亂局，可為殷鑑。

筆者不是危言聳聽，而是由今年元旦以降以至反高鐵的示威等，在在顯示出激進主義的魔影已經在牆角晃動，再不讓香港人有一個大家都信服的機制來解決政治以至經濟矛盾，香港遲早會步上泰國等國家的覆轍。

若從喬曉陽講話的字面來看，可以解讀成中央政府是試圖以法制的步驟來阻攔香港人實行普選。（中新社圖片）

或許有人說香港是和平社會，不會出現因政制紛爭而引致泰國式街頭抗爭，問題是香港人以往的抗爭包括二〇〇三年七一那次大規模抗爭，香港人仍然對前景抱有一點希望，不希望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受到重創。

但今天形勢不一樣，經濟轉型令一群八十後及九十後變成「前無去路、後有負擔、既無希望、又缺機會」的一群；只要他們細心一看，一切都因為香港的大地產商在北京的掩護下壟斷政治權力使然，而北京又堅拒實行普選來建立一個公平而不是只向大地產商傾斜的政治制度，年輕人轉趨激進是完全有可能的。

張宇人議員對勞工階層那份「給你二十元一小時也嫌多」的嘴臉使人憤怒，而張議員和某大地產商的「高薪顧問」關係使人聯想這可能是大地產商們的意思，再加上港府在大地產商「賣發水樓」以至一些涉嫌違規的事件上，表現軟弱。某大地產商以瘋狂跳層方式賣樓，特首至今也只是說「跟進」，連重一點的字眼如「追究」兩個字也不敢說。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

大地產商那種財大氣粗，在特區議會層面上頤指氣使，在北京那邊又對港局指指點點的嘴臉，年輕人看在眼裏，怒在心裏！任何對大地產商利益有損而對民眾有利的事情如最低工資又或者規管賣樓的法案，都因為功能團體議員的阻撓而無法通過，甚或提出。

最後香港出現了賣海味或抽油煙機誤導要坐牢或面對檢控，但誤導市民「一生最重要投資」的大地產商示範單位，政府只敢提出沒有法律效力的指引，應了古人一句：竊鉤者誅，竊國者侯。

而這一切都可以被解讀為：大地產商透過在北京和香港的政經網絡，以控制特首選舉委員會和保留功能團體等方式來左右香港政局，令對群眾有利的法例如嚴格規管賣樓的法例不敢提出、又或者如最低工資只能訂在可有可無的水平，但對大地產商有利的高鐵便可以強行通過。西九的土地會即時升值，而那個和張宇人議員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大地產商，恰巧又在西九擁有龐大地產利益。

香港人尤其是八十後及九十後，只是細心一看，香港人的「衣食住行」無一不受大地產商影響，而香港社會要求公平正義的訴求如通過一些保護香港買樓人士的消費者法律卻連提出的機會也沒有，而北京卻因為對泛民的不信任，以為泛民想透過民主制度來奪權，於是堅持不在普選上作鬆動，執意保留功能團體，客觀上為大地產商所利用。

功能團體殘民自肥

最後香港人的正義訴求不能得到伸張、合理利益不能得到保護，大地產商卻躲在北京的保守大旗後面予取予攜，指點江山。功能團體議員因為這個微妙局面而得以繼續對大地產商獻媚謀利，殘民自肥。泛民的溫和派則因為政改每次建議都毫無寸進，只能被迫機械地否決每一次政改方案，最後溫和派無法在實效上抗衡激進主義，群眾轉而支持激進，以宣洩心中積壓的挫敗感，到時中央政府代表便會首當其衝！

今年元旦年輕人衝擊中聯辦，連社民聯的頭頭勸阻也不聽，可以說是一個重要警號，失控的苗頭已經顯現，中央政府再不透徹理解局面，以為用錢便可以搞定香港人，於是把政制問題拖得便拖，是脫離實際的研判。激進抗爭文化一旦紮了根，到時只要有一名激進青年流第一滴血，以針對功能團體議員來發洩對政經不公義的不滿，那時局面便會歪變，形勢將一發不收拾。可惜筆者雖然私下和公開撰文都曾多次提出這個警號，但從喬曉陽「四一四」的表現看來，至少喬老爺不明白這個深層次矛盾的危險性。

溫家寶總理最近撰寫《再回興義憶耀邦》說：「對擔負領導工作的人來說，最大的危險就是脫離實際」。他又提到當年胡耀邦叮囑他要不和地方政府打招呼，直接到基層了解民間疾苦。或許是時候溫總理要求負責香港事務官員訪港時，不要每次都只是下榻大地產商的酒店，而是切切實實地去了解香港複雜的深層次矛盾！

中產動力主席、南區區議員